

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动因、挑战与突破路径

王孝松¹ 李 彤²

(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2.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贸规则深度重构的背景下, 对外贸易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命题。本文从“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逻辑视角出发, 在梳理我国外贸历史成就与发展阶段转换的基础上, 系统剖析了驱动外贸转型的多重动因及其面临的现实制约, 并提出突破路径。研究表明, 我国外贸转型是由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内生动因、大国博弈加剧的外生动因以及国内对高质量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共同驱动的。我国外贸转型仍面临潜在优势向现实竞争力转化不足、价值链高端环节控制力偏弱、大国竞争加剧与国际不确定性上升、深度开放背景下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等多重约束。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市场布局与供应链网络、优化贸易方式与扩大高质量进口、发展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加强自主创新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外贸转型突破路径, 进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由规模扩张导向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导向, 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跃升。

关键词: 对外贸易转型; 动态比较优势; 以开放促改革; 高水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 F752 /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26) 03-0001-12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25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 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进口18.48万亿元; 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8.08万亿元, 其中出口3.63万亿元、进口4.46万亿元,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8,287亿元。2026年1~2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7.73万亿元, 同比增长18.3%。我国对外贸易不仅保持了较大的体量和较强的增长韧性, 随着进口与出口协调性增强、服务贸易规模扩大,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体系韧性建设。

但随着发展阶段转换和国际经贸格局重塑, 支撑我国外贸长期扩张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改变。人口红利收缩、要素成本上升、环境约束趋紧, 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和加工装配扩张的发展方式边际收益持续下降; 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贸易规则竞争加剧等因素造成我国外贸风险增加。我国对外贸易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亟需进行转型发展以应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和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拓展国际循环,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因此,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目标在扩大外需、带动增长之外, 还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深化等方式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推动开放型经济

作者简介: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李彤,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及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23JJD79001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经贸政策重大调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 25JZD019)。

运行机制重构、增强国际竞争力并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从现有研究看,对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分析已经成为理解当代开放型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切口。一方面,国际经贸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对一国外贸竞争力的考察已不能停留于总量贸易,而应转向价值链位置和增加值获取能力的综合衡量(Koopman et al., 2014)。效率不是生产网络布局的唯一准则,风险分散与韧性提升正在成为影响贸易格局演变的重要约束(Baldwin and Freeman, 2022)。外部需求波动与地缘政治冲击会显著削弱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韧性,但我国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内外市场需求协同,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冲击(唐宜红等, 2025)。积极深化区域贸易协定,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和我国产业链的韧性(李丹等, 2025)。另一方面,我国外贸面临的是发展方式、竞争优势和开放机制的系统性调整问题。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在于通过规则对接和制度联动推动国内改革深化,并增强规则供给能力(刘斌和刘一鸣, 2023);数字贸易规则竞争已延伸至数据流动、平台治理等更深层次制度议题(梅傲和朱嘉炜, 2025)。

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关于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讨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国际政治经济约束条件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寻求比较优势动态重塑与制度竞争力提升的过程。本文将系统梳理我国对外贸易转型的现实基础,以“以开放促改革”为主线,深刻剖析其多重动因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并着力探寻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重塑全球价值链的突破路径。

一、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与阶段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并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长期积累形成的规模优势,我国具备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现实基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撑外贸快速扩张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既是破解传统发展模式约束、缓解要素失配和结构失衡的现实要求,也是顺应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升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考察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阶段变化及其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就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正式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自此,我国从试行对外贸易、扩大对外贸易、全面发展对外贸易逐步迈向发展开放型新经济,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贸易新格局。我国对外贸易是推动工业化、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就业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逐步拓展为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增长、促进升级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放型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显著增强。我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张,具备组织国际分工的产业体系和开放基础,图1为我国2021~202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总体保持增长态势,连续多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十四五”时期累计进出口规模突破200万亿元,年均增长7.1%。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的支撑基础逐步转向技术能力、产业链协同和品牌竞争力,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到60%,高技术产品出口5.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我国贸易结构和市场布局不断改善,进

出口协调性增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 51.9%，对东盟、拉美、非洲等市场贸易保持增长。我国服务贸易和新业态加快发展，2025 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8.08 万亿元，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 2.75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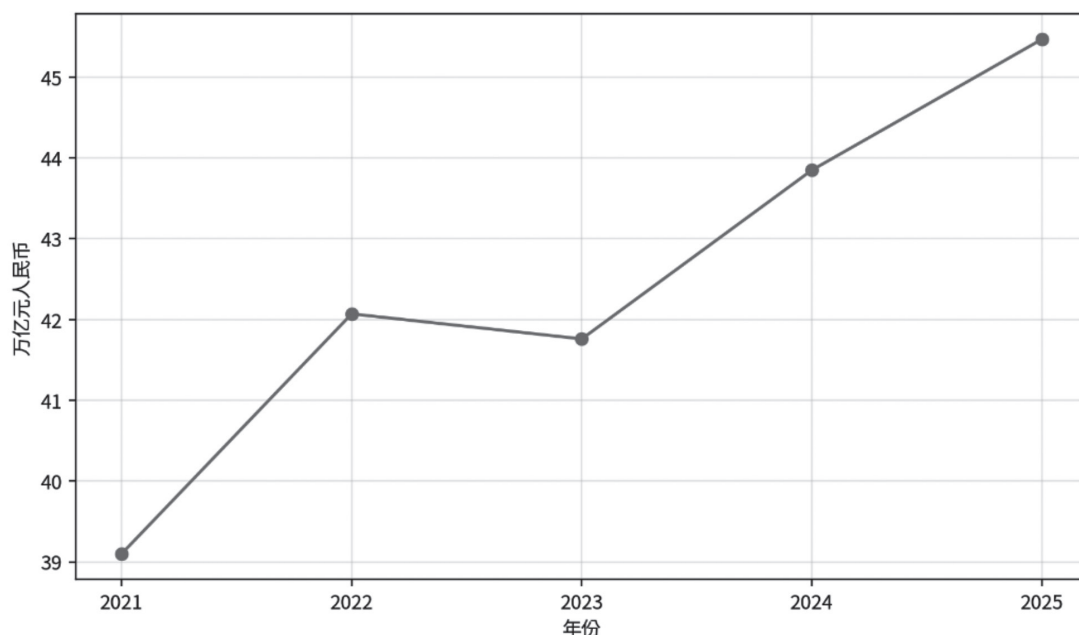


图 1 2021~2025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

我国外贸成就不仅体现为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也体现为战略选择和制度体系的持续演进，顺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结合自身的禀赋和技术特征，适时推进贸易转型。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我国从最初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贸易自由化战略、新时代的贸易强国战略稳步转变，体现了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贸易发展的地位、作用及路径不断进行战略性调整（盛斌和魏方，2019）。在开放区域与领域方面，从最初对经济特区的试点探索，渐进扩大到沿海地区并向内地纵深推进，从农业、制造业逐步向基础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全面扩展。在主要政策和体制改革方面，从最初允许开放、放开各项限制，到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运行效率，从单纯的“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外贸领域的各项体制机制改革始终在适应开放和发展的需要，为我国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张宇燕，2018）。近年来，我国外贸战略逐步转向更加重视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和贸易强国建设的新阶段。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国外贸转型发展提出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在实践中不断动态调整发展模式，过去 40 年的高速扩张为我国积累了推进贸易转型的现实基础。当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我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被规模扩张掩盖的深层次矛盾，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显化。旧有的贸易发展方式与不断升级的要素禀赋之间产生摩擦，对外贸易亟待转型发展。传统贸易发展方式积累的结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人口红利减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持续收缩。依赖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环节参与国际分工方式造成我国在价值链低端的锁定。现有外贸政策体系在市场准入、规则对接以及政策协同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随着外贸增长由高速扩张转向平稳增长，这些结构性约束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推进对外贸易转型发展具有双重必要性。一方面是回应既有发展方式内在约束、缓解要素失配、结构失衡和制度短板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目标转换、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主动选择。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核心已不再局限于扩大出口规模,而是要围绕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推动我国外贸由要素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由低附加值竞争向技术、品牌、服务和规则综合竞争转变。从更深层次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外贸转型发展也是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以制度优化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过程,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国际循环能力和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环节。

(三)我国外贸转型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关键一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压力和规则约束,再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开放质量。外贸转型发展既直接反映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也构成倒逼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抓手。我国经济内部一系列结构性深层矛盾逐渐显现,又面临国际经济格局重塑等紧迫挑战,这些新问题是旧有的发展方式无法解决的,必须“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实现新思维新突破(常修泽,2019)。

过去支撑我国外贸快速扩张的条件正在变化,而原有发展方式所隐含的结构性问题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约束。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单纯依靠内部渐进调整难以形成足够强的制度变革动力,更高水平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规则对接压力,能够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我国外贸转型不只是对贸易发展方式的修正,更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提升开放质量的制度过程。外贸转型发展还可以提供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平台,在实践中,坚持渐进开放的制度演进逻辑。通过在经济特区先试先行,不仅有效避免了一步到位的全面开放可能导致的严重冲击,还在地区开放竞争中建立起开放型经济体制。依托这种制度创新平台,外贸转型为企业扩大出口市场规模、缩减单位研发成本提供了政策支持,切实推动了国内产业向创新驱动的实质性跨越。

在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竞争的重心逐步转向技术能力、规则适应能力、供应链组织能力和安全韧性。面对这种变化,我国外贸发展必须通过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制度优化和结构升级,在更广范围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市场多元化布局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因此,我国外贸转型发展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它通过推动贸易结构调整等方式改变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政策协同和制度创新,清除改革深水区的桎梏,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良性循环,形成中国特色的开放体系。

二、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多重动因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国际经贸格局深刻变化与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原有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和低端嵌入的外贸发展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因此,系统分析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动因,不仅有助于把握外贸发展方式变化的内在逻辑,也有助于为优化贸易政策、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总体来看,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国内发展阶段跃迁形成的内生升级压力,在比较优势动态重组和全球分工地位提升背景下,外贸发展进入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的新阶段;二是国际经贸格局重塑所带来的外部

倒逼压力，新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冲击和规则竞争加剧，迫使我国加快调整贸易结构和发展方式；三是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制度重构需求的持续增强，即通过更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以制度优化回应国内外规则环境变化，为外贸转型发展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正是在内生升级、外部倒逼和制度重构三重力量共同作用下，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才具有了鲜明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发展阶段转变与比较优势动态重组的内因驱动

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内生驱动主要来自 3 个方面：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动态比较优势重组，超大规模市场和“双循环”格局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更高发展要求。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首要动力来自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带来的内生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持续扩大，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也不断转变。不同发展阶段的贸易战略选择，本质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李坤望，2008）。这一过程可以视作比较优势的动态重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会推动一国比较优势随发展阶段而演化，资本—劳动比率上升、技术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都会促使贸易优势由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Oniki and Uzawa, 1965）。

我国正处在旧比较优势递减与新优势成长并存的过渡阶段，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有所减弱，但高端技术、品牌影响力、规则塑造能力和高附加值服务支撑能力的比较优势还未完全建立，需要我国进行对外贸易转型发展，塑造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我国首先依托充裕劳动力供给和较低要素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领域形成优势，并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但随着人口红利边际减弱，传统比较优势持续收缩，原有以低成本加工制造为核心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变动并非短期现象，而是发展阶段跃迁的长期表现（龚刚和马丽，2018）。传统优势逐步减弱以后，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产业链协同能力便成为重构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关键变量。我国通过开放引入先进企业、设备和中间品，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技术模仿、学习和吸收的机会。我国外贸转型发展是对我国贸易过程中的比较优势进行动态重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率提升和新旧动能转换，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并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和“双循环”格局为外贸转型提供支撑。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不仅增强了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迭代以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这种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优势。为充分释放这一优势，客观上要求通过高水平的制度供给与“以开放促改革”，破除内外贸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

另外，我国想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需要外贸转型发展。我国过去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加工组装和低附加值环节，随着产业能力、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上升。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并依附于中心国家，实行追赶式发展。中心国家往往依靠资金和技术优势，使得外围国家承接落后产业，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种全球分工模式形成了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翟婵和程恩富，2019）。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必须推动自身由被动参与转向更高附加值、更强控制力和更高规则适应能力的主动型参与。

（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大国竞争格局变化的外部倒逼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与大国权力格局的变化，外部环境变化是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力量。新技术革命改变了贸易形态，地缘政治冲击改变了政策逻辑，规则竞争重塑了全球分工秩序。我国外贸转型已不仅是适应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需要，也是回应国际体系重构、提升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的必然选择。新技术革命和新业态发展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运行方式，并对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形成冲击。新技术并不仅仅拓展了贸易增长空间，更在重塑竞争基础和政策边界。对我国而言，只有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趋势，推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更高水平协同，才能将外部技术冲击转化为促进出口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外部动力。

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正在强化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外部倒逼机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保护主义抬头，原有贸易格局被打破。在不完全竞争和国家竞争加剧背景下，贸易政策不仅服务于利润转移，也可能服务于产业主导地位塑造和战略性产业控制（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全球竞争的重心已经扩展到规则设定、供应链布局、关键技术控制和安全治理等维度。我国外贸发展若仍停留于低附加值和低规则含量的竞争方式，将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政策歧视。亟需调整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倒逼出口产业更大程度地利用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提升，进而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

国际规则竞争和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客观上提高了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制度要求。随着区域贸易协定深化、数字贸易规则重构以及绿色规则加快形成，“制度型公共产品”供给正在成为竞争焦点。谁能够在规则、标准、认证和监管合作方面形成更强影响力，谁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我国外贸转型发展在产品层面的升级之外必须同步推进市场多元化、供应链网络化和规则适应能力提升，在应对外部冲击的同时形成更有效的制度回应。我国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新业态领域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这就要求必须主动调整贸易政策，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国内规则与国际接轨，将技术领先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制度优势，从而在新的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

（三）高水平开放与深层次改革互动的制度推动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第三重动力，来自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制度重构需求的持续上升，集中体现为3个方面：高水平开放对制度供给提出了新要求，国际规则变化和高标准开放对接倒逼国内改革深化，外贸转型能够通过制度优化反过来支撑更高层次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由要素流动型开放逐步走向制度型开放，外贸发展所依赖的制度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早期外贸发展更多依靠关税减让、要素流动、成本优势来推进，制度层面的约束尚未充分显现，但当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到新的阶段后，影响外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已越来越多转向边境后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制度供给能否适应更高水平开放要求，逐渐成为外贸转型发展的关键变量。

从现实看，现有制度供给与高水平开放要求之间已出现一定不匹配的情况，已有的贸易发展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转型，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新型外贸体制，推动对外经济贸易取得新的发展。随着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向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延伸，传统服务于货物贸易扩张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安排已难以完全适应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方面，我国外贸发展越来越依赖更高水平的制度协调和规则衔接。外贸转型发展还要求通过制度重构

为开放提供稳定、透明的规则环境。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因，还因为高水平开放本身具有明显的改革倒逼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开放不仅扩大了资源投入的规模，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而且还能够促进制度供给的有效变迁。开放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制度参照和规则约束，能够将外部环境变化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些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例如市场准入壁垒、要素流动不畅、产权保护和规则透明度较低等深层次问题，需要借助更高水平开放形成外部压力和制度参照，推动国内体制机制优化，在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外部竞争压力转变为内部改革动力，在贸易转型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中促进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发展。

我国外贸转型发展还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外贸转型不仅要推动出口由中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升级，也要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发展与金融开放之间形成更高水平联动。只有在制度供给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贸易转型才能进一步拓展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并为金融开放、服务业开放以及更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对接奠定基础。外贸转型发展既是高水平开放向更深层次延伸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国内制度环境与国际规则体系逐步衔接的重要载体。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我国摆脱对低成本要素投入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依赖，把发展动力更多建立在创新、效率和制度供给之上。外贸转型通过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不仅能够提升外贸发展的质量和韧性，还能够通过制度改进带动更广范围的经济转型升级。

三、我国对外贸易转型的制约因素与挑战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深刻调整背景下的复杂过程。当前，我国外贸转型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方式重塑和开放体系升级的关键阶段，既面临传统优势递减而新优势尚未充分形成的内在张力，也承受着国际竞争格局变化和制度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的外部压力。这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潜在优势向现实竞争力转化不足，表现为高端技术能力、价值链关键环节控制力以及高附加值贸易能力仍然偏弱，构成转型的内部能力约束；二是大国博弈加剧与统筹发展安全的现实挑战，持续抬高外贸转型的外部成本与不确定性，形成外部冲击约束；三是深度开放背景下的体制机制堵点与规则壁垒，内外贸一体化仍存在堵点，高水平开放所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健全，制度供给能力与转型要求之间仍有落差。准确把握这些制约因素的具体表现及其作用机制，是识别外贸转型堵点、优化政策供给并科学谋划突破路径的前提。

（一）潜在优势向现实竞争力转化不足的能力约束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面临的重要内部挑战在于潜在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的现实竞争力。我国已经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较强制造配套能力和持续上升的创新投入，这些都为外贸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这些优势尚未全面转化为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能力、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能力、对国际规则和高端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积累不足，导致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缺乏实质控制力。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但制造规模优势并未自动转化为高端技术优势，在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领域，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差距，支撑我国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原创技术、基础研究和关键环节自主供给能力尚未完全形成。这种自主创新能力的短板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容易被替代，不

仅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还要承担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代价。在缺乏核心技术情况下，我国外贸很难突破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壁垒，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严重受限。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已经是重要的生产和供应节点，但还没有成为高端规则、核心技术的重要主导者。规模优势与高端控制力不完全匹配，决定了我国外贸转型发展无法通过扩大出口规模自动实现，必须经过更艰难的能力跃迁过程。

我国要素配置存在结构性摩擦导致新旧动能衔接不畅。对外贸易转型需要一国将生产要素从低效部门转移到高效部门，并重构在全球分工中的权力地位。然而，这种能力的重构需要极高的内部条件支撑。我国庞大的生产要素过去深度沉淀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中，虽然当前人口红利下降使得这类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但这些要素并不能立刻且无摩擦地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加工贸易长期存在的人均工业增加值低、资本劳动比低、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问题（余淼杰，2011），使得这些企业既无力进行技术升级，又因沉没成本过高而难以迅速退出，从而形成了资源占用的锁定效应。另外，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的高级生产要素在短期内供给严重不足。如果高端要素不能有效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即使具备市场规模和产业基础，也难以顺利形成稳定的新优势。

这种能力短板还表现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竞争力不足。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服务贸易逆差仍然存在，服务贸易短板的存在，说明我国高附加值服务供给能力尚未完全成熟。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虽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新方向，数字贸易改变了传统贸易的组织方式，绿色贸易则体现了全球消费偏好和规则体系的深刻变化。从现实看，我国虽然在跨境电商、数字平台应用等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在数字贸易规则适应、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绿色标准对接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约束。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和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和竞争规则，过去依靠“市场换技术”的后发追赶路径已越来越难以持续。如果自主研发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同步提升，我国外贸就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面临旧动能减弱、新动能不足的双重压力。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品牌塑造、产业链升级等方式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的控制能力。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贸易模式，也对我国监管体系和规则制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必须同时兼顾发展速度、就业稳定、环境保护与规则重构的约束，客观上限制了外贸转型发展的空间，使得整体转型步伐必须受制于内部统筹能力的上限。

（二）大国博弈加剧与统筹发展安全的现实挑战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不仅受制于内部能力的短板，而且面临着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直接冲击。当前，支撑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与技术红利明显衰减，大国竞合关系发生质变。这种外部不确定性的上升，不仅表现为全球总需求的疲软，更体现为针对我国产业攀升的系统性遏制。来自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等因素会影响我国外贸转型发展，这些外部环境变化既可能构成倒逼升级的压力，客观上也会在转型推进过程中增加调整成本、放大风险暴露并延缓新优势形成速度。

全球贸易目前受到全球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分化、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成本上升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和全球分工体系，外贸转型发展在低需求、弱复苏和高波动条件下展开。随着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

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正面临越来越多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同质化竞争，低端市场份额被不断分流；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由互补逐渐转向竞争。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将贸易和产业政策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之下，贸易政策的功能更多服务于技术遏制、产业控制和供应链重组。

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例，2025年美国先后通过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及其修订，对我国输美商品税率作出多轮调整，并将相关措施与双边经贸谈判等议题结合。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应视为大国竞争背景下贸易政策安全化的集中体现。对于我国而言，这种变化会直接提高出口不确定性，削弱企业对外投资和供应链布局的稳定预期，也会在高技术、精密仪器和关键中间品等领域增加“卡脖子”风险，从而制约外贸转型向价值链高端推进。供应链区域化和地缘政治冲击还会削弱外贸转型所需的外部资源获取能力，传统建立在效率优先基础上的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增加我国外贸转型的组织成本与制度摩擦，迫使我国在尚未形成稳固新优势之前，面对更高强度的国际竞争和更高门槛的制度压力。

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统筹难度也明显上升。高水平开放要求扩大合作、深化规则对接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外部环境安全化又要求增强产业链韧性、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和风险防范能力。因此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外部挑战在于如何在更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实现开放效率与安全底线的动态平衡，不仅要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更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增强风险识别、制度回应和供应链治理能力，以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安全，在增强风险韧性和提升制度适应能力中推进转型发展。

总体来看，大国竞合加剧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之所以构成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重要外部约束，并不只是因为它增加了短期波动，更因为它通过贸易政策安全化、规则竞争强化、供应链重组和安全压力上升，系统性抬高了外贸转型的制度成本和推进难度。这意味着外贸转型不能仅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角度加以理解，还必须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约束下开放与安全的统筹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制度型开放、利用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时必须审慎权衡开放的优先顺序与重点领域，客观上增加了外贸政策宏观统筹的复杂性，使得深化改革开放的步调必须更加稳妥与谨慎。

（三）深度开放背景下的体制机制堵点与规则壁垒

对外贸易转型不仅是产业层面的跨越，更依赖于高质量配套制度的重构。然而，在向深度开放迈进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国内体制约束与国际规则竞争性重塑的双重影响。国内层面仍存在内外贸一体化不畅、服务业和要素开放不足、部门协调成本偏高以及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国际层面又面临高标准规则扩展、限制性措施累积和合规要求带来的外部压力。因此，我国外贸转型发展不仅要解决产业和产品层面的升级问题，更要解决制度环境是否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支撑的问题，应该积极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并加快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国内外贸一体化仍存在较多制度性堵点，削弱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配置的效率。内外贸在产品标准、检验认证、市场准入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分割。若内外贸规则转换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就难以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实现灵活切换，外贸转型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另外，现有体制机制与高水平开放要求之间仍存在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仍然相对不足，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也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服务业开放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强会直接制约外贸转型所需的高附加值服务支撑能力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

我国外贸转型发展还受到政策协同不足和改革成本上升等体制性约束。许多影响外贸转型的关

键问题涉及贸易、产业、科技、金融、环保、数据监管等多部门协调，规则衔接不畅、部门间协调成本较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出现制度供给滞后于市场变化的情况。国内的监管机制、营商环境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规则之间依然存在落差。这种制度供给能力的阶段性不足使得我国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转型动力的严峻挑战。

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也在明显增强，并通过合规成本和规则适应成本向国内传导。当前国际上限制措施与高标准规则、绿色标准、供应链审查和技术合规要求相结合，我国外贸转型发展面临的不只是关税壁垒，而是服务贸易准入和边境后监管等更深层次制度性约束。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继续保持较强主导权，并将市场开放重点更多转向服务业准入和监管一致性等议题。这种将贸易限制与高标准规则绑定的做法，构成了隐蔽的新型壁垒。它不仅直接限制了我国商品的自由流动，更大幅抬高了外贸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合规成本，限制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

四、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突破路径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动因，既来自发展阶段跃迁、比较优势重组和分工地位提升等内生力量，也来自国际经贸格局重塑、规则竞争加剧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倒逼，同时还受到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内外贸衔接不畅以及高端能力形成滞后等现实约束。因此，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突破路径，应在“以开放促改革”的框架下，通过更高水平开放引入规则对接与竞争压力，通过改革释放要素配置效率，再把这些能力回流为新的比较优势与更强的国际不可替代性，从制度、能力、结构、市场等多个层面系统推进。

（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开放改革互动机制

针对国内深度开放面临的体制机制堵点与规则壁垒，首要路径是实现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全面升级，形成开放、改革与发展联动的长效机制。一是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破除制度壁垒。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先导作用，在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议题上加大探索创新。通过深度对接 CPTPP、DEPA 等高标准规则，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切实降低外贸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制度衔接与国内大市场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尽量降低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障碍，提升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

（二）优化市场布局与供应链网络，增强外贸体系韧性

面对大国竞合加剧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约束，我国外贸转型还必须在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对少数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会在外部冲击上升时放大外贸脆弱性。因此，我国外贸转型发展的方向还有市场多元化和供应链网络化重组。一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深化与东盟、中东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不仅为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寻找新的广阔市场，还能有效对冲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构建区域产业链互补格局，化解产业转移风险。应当主动通过对外投资进行产业布局，通过资本与产能输出，建立以我国为核心的中间品供应网络。这既能解决国内加工贸易缺乏出路的难题，又能实现国家间产业链的深度互补，提高外贸体系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韧性。

（三）优化贸易方式与扩大高质量进口，推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

我国外贸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潜在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高附加值竞争力，低附加值问题仍然

存在。因此,突破路径必须围绕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国内价值链和增强中间品嵌入能力展开。一是要进一步提高中高端制造出口比重,推动出口由低成本竞争向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综合竞争转变。二是通过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中间品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发挥进口在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中的引擎作用。扩大进口是通过竞争压力和要素输入倒逼国内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市场响应能力的重要途径。要更加重视中间品贸易和产业链嵌入能力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增强我国作为关键中间品供给者和供应链组织者的地位,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进出口动态平衡。

(四)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我国外贸转型必须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作为新动能培育的重点方向。服务贸易代表着高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度的发展方向。数字贸易则改变了传统贸易的组织方式和竞争基础,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增长点。绿色贸易是培育国际新优势和应对绿色壁垒的重要抓手。针对传统货物贸易面临的动能衰减与低端锁定约束,必须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在服务与数字领域培育新比较优势。一是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通过不断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扩大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双向交流,优化服务业结构,推动服务贸易转型升级。二是顺应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新趋势。我国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促进跨境电商等新模式发展。不仅要在底层数字技术上实现突破,更要力争在数字贸易规则、绿色环保标准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培育中间品贸易与绿色贸易的新增长点。

(五) 加强自主创新,夯实外贸转型的产业基础

我国外贸转型面临的内部挑战核心在于高端能力形成不足。因此,要把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夯实外贸转型基础的根本路径,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开放合作并重的创新体系。一是强化基础研究,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给予基础科学研究充足的资源支持,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通过加快进口替代和加强高端制造产业投入,尽早摆脱对外部核心技术的依赖,从根本上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引导资本赋能科技创新。进一步放宽金融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开放债券市场和信用评级业务。及时跟进国内金融基础设施与投融资监管改革,只有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更高水平,才能在开放中形成新的稳定比较优势,真正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跃升。

(六)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开放条件下的制度话语权

当前国际贸易的安全化、规则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统筹已经成为外贸转型绕不开的问题,必须加快构建适应高水平开放的新型治理体系。我国必须将国内改革与全球治理深度融合。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并加快推进WTO等国际多边体制改革,提供我国视角的制度型公共产品。通过在多边和双边谈判中积极发声,努力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我国外贸的长远转型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宏观环境。

参考文献:

- [1] 常修泽. 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J]. 改革与战略, 2019(8).
- [2] 龚刚, 马丽. 从中美贸易战看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J]. 财经论丛, 2018(11).
- [3] 李丹, 吴桐, 李茹, 等.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稳定性[J]. 国际贸易问题, 2025(12).
- [4] 李坤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4).
- [5] 刘斌, 刘一鸣.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 对接与联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3).

- [6] 梅傲, 朱嘉炜.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及制度型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因应 [J]. 经济学家, 2025(2).
- [7] 盛斌, 魏方.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70 年: 回顾与展望 [J]. 财贸经济, 2019(10).
- [8] 唐宜红, 王雯洁, 张鹏杨. 外部需求、国内市场规模与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5(12).
- [9] 余淼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11(4).
- [10] 翟婵, 程恩富. 我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确立“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新理论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10).
- [11] 张宇燕. 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与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1).
- [12] Baldwin, R., Freeman, R. Risk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2, 14.
- [13] Brander, J. A., Spencer, B. J.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18(1~2).
- [14]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 [15] Oniki, H., Uzaawa, H. Pattern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Dynamic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 32(89).

The Motivation, Challenge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ANG Xiaosong LI To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lowing global growth,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nd a profound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in advancing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opening up,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stage transi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ple drivers of its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major constraints it faces, and then proposes corresponding breakthrough path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is jointly driven by three forces: endogenous drivers arising from shifts in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ogenous drivers associated with intensifying major-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growing domestic demand for high-quality institutional supp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remains constrained by the insufficient conversion of potential advantages into actual competitiveness, weak control over high value-added segmen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ising major-power rivalry and international uncertainty, and inadequate institutional supply under deeper opening up.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policy paths for advancing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steadily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optimizing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supply-chain networks, upgrading trade patterns while expanding high-quality imports, developing services trade and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ing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se efforts will help accelerate the shif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a scale-expansion orientation to a quality-and-efficiency orient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major trading nation to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opening up; high-level opening up

(责任编辑: 张建华)